

中国文学与人间情感教育^{*}

——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

周 勇

摘要 依靠悲剧哲学和以情感美学为本的文学理论,王国维重建了传统及各种功利的文学内涵界定与文学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他通过研究中国抒情文学及其境界之美,充实了其文学课程的内容架构,从而完成了以人间情感教育为宗旨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这一长达十年的文学课程革新探索不仅盘活了许多被历史遗弃的中国文学,而且为教育、引导个体在世俗人间安顿自己的情感生命,开辟了一条“境界”优美的文学途径。

关键词 王国维;文学课程革新实验;中国文学;人间情感教育

作者简介 周 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上海 200062)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出现过许多中西学术文化底蕴深厚的自由教育学家。他们并非科班或专业教育学出身,却有着自己的教育学兴趣,并以自己的学术文化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校体系的知识内涵与教育气象,使许多现代中国学校弥漫着至今仍让人怀念的学术文化氛围。罗振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钱穆等都是此类自由教育学家的突出代表,其中本文所要考察的王国维更是曾提出,必须将教育学和哲学视为最重要的学科,所有学科都是它们的教育实践机制,无论各文理学科下设多少科目,都应把它们列为基本科目。^[1]

王国维的方案无法被当时主持中央学术教育体制改革的张之洞理解,但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文史哲学术革新实践,来应对剧烈历史变迁造成的教育问题。而罗振玉、张謇等地方教育领袖以及蔡元培、胡适等全国学术教育精英则为王国维提供了实践平台,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科学术与文科课程范式的缔造者之一。然而,如一位青年教育学者所言,过去 30 年,教育学界对于王国维的教育贡献一直都未给予足够重视,只看到毛礼锐、张瑞璠、黄书光、肖朗等教育史学者曾推出“教育思想”、“教育哲学”、“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以及“美育”等分析框架,探讨王国维在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理论)发展进程中的贡献。^[2]

可以说,教育学界已有研究只是致力于清理、确立王国维的“教育思想(理论)”成就与影响,尚未涉及王国维在文史哲等文科领域自觉进行的课程革新探索。文史哲学界上世纪 90 年代就确立了王国维的“学术大师”地位,并对其哲学、文学与史学活动做了许多深入研究。由于学科与专业分工体制的隔离,这些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现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文化认同危机与课程重建途径:王国维、胡适与钱穆的探索”(项目编号:10YJC880170)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课题“现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建构、课程改革与学生行动”(项目编号:11PJJC046)的研究成果。

研究几乎不会从教育学或“课程论”的角度沉思王国维的学术创造,但它们却为研究王国维的文科教育内容与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只要对现有学科分界稍加突破,将王国维的学术活动纳入教育学的视角下考察,便能更进一步认识王国维的教育或学术贡献。即如从“课程论”的角度审视王国维为追求其教育理想展开的学术活动,就可以提出“王国维文科课程革新实验”这一未曾探讨的研究主题。

从学科来看,“王国维文科课程革新实验”的内涵结构无疑十分复杂,涉及王国维在教育、哲学、文学、史学等文科领域的全部“课程开发”尝试及结果。本文无力全面考察王国维所涉学科如此众多的课程革新实验,只能聚焦于文学领域,通过王国维为重建文学教育而创作的论文本以及《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最能表达其教育理想的文学研究范本,同时参考人文学界的相关研究,来分析王国维文学课程革新实验的理论基点,探讨其文学新课程的内容架构与教育意义。这一实验不仅能够深化教育学界已有的王国维研究,使考察对象由王国维的教育学文本拓展到王国维的文学文本,而且可以揭示王国维到底贡献了什么样的文学课程与文学教育新范式。

一、情感美学:文学本质与文学课程标准重建

如前所述,本文第一项任务是分析王国维文学课程革新的理论基点,揭示王国维从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出发,来展开其文学课程革新实验。不过,在分析之前,还需交代两点基本情况。首先,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正式开始于1904年。这一年,王国维推出《红楼梦评论》,公布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范本。1913年,王国维完成《宋元戏曲史》,之后转入史学领域。可见,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前后大约持续了十年。其次,在以新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重建文学课程及文学教育之前,王国维主要是在哲学领域展开自己的学术与教育革新活动。早年这段哲学岁月让王国维接触到了康德、尼采、席勒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与美学,尤其是叔本华的“悲剧”人生思索,更是被王国维引为知音之言。

这段哲学经历没有让王国维推出“中国哲学”课程(后来胡适依靠实用主义哲学率先创造了“中国哲学史”课程),但却为他革新文学课程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从席勒、叔本华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出发对文学进行重建的学者,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的现代转变进程。自韩愈以来,中国文学活动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至程朱理学成为“知识权力”,文学虽然十分活跃,但由于总是很容易在背离“天理”的“人欲”领域进行活动,又被认为是“有害于道”。经过王阳明对程朱理学进行大胆改造,以解放被压制的“主体性”,文学终于在晚明时期迎来更自由的生长局面。但此后,文学又遭考据学与程朱理学的双重压抑,思想出格一点的文学作品往往因为不敢直接署名而被淹没。

在此传统文学实践的总体格局下,即使最受学人推崇的文学研究,即诗词及

小说点评 在理论上也始终未能突破“文以载道”传统。尤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传统文学实践,还是传统文学研究,其主导思想与精神均未达到哲学水平,文学主流因此不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展开探寻,而是达成其他非哲学目标的工具。不仅如此,诗词及小说点评等文学研究作为科举教育体制之外的一门功课,也如温儒敏教授所言,主要是在封闭的“文人”小圈子里流行,它“所依赖的不是一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彼此接近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趣味”,即外人很难把握的“默会知识”。这显然不利于形成开放普及的文学教育。^[3]与此同时,被“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支配的教育体制也无法让文学成为备受重视的课程,进而激起广泛的文学兴趣。文学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或课程,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事,但其先驱推动者正是王国维。

王国维不仅批评张之洞的学制改革不重视文学,呼吁给予文学重要的学制位置,而且在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前,便依靠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率先为后来发展文学教育体系提供了一种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正是由于王国维的理论努力,文学突破了“道”(传统政治与社会伦理)和其他功利目标的束缚,获得了更具本位意义的内涵,变成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展开哲学思索,文学课程也因此形成更具情感美学教育价值的标准。具体来说,王国维通过引入叔本华的“悲剧”人生哲学,推出了“悲剧”文学理论。由此,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的本质、标准或价值,均不再取决于“道”,而是取决于是否是在思索、表达人类的悲剧情感体验与真相。

1904年,王国维推出《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为了拯救这部在传统文学大格局下难得出现、几被淹没的文学杰作,更是为了示范如何依靠“悲剧”文学理论,分析其情感美学价值。在他看来,《红楼梦》之所以重要,原因绝非如当时考据学者所想,从中可以“索隐”大量考据答案;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以艺术方式展现了“生活之欲”造成的人类终极情感痛苦,同时指示“解脱之道”。曹雪芹以艺术刻画这一哲学意义的存在主题时,目的也十分纯粹,只是为了思索、表现悲剧人生真相。与之相比,即便是《桃花扇》,也未做到纯粹的美学思索,仍夹有政治及历史功利心。^[4]王国维将叔本华“悲剧”概念套于《红楼梦》或许有些机械,将曹雪芹看作纯粹的悲剧哲学家和艺术家,也难免惹来非议,但这样做却可以从理论上凸显文学的人类情感美学新本质,使文学超越“道”或其他外在功利目标。

随后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还将自然深刻的情感思索视为“真正文学”,以之对应各种徒有文学外壳的“文绣的文学”。^[5]这亦是强调文学的哲学与情感美学本质。总之,王国维不仅提出了“悲剧”文学理论,而且将文学本质内涵界定为思索、表达自然深刻的人类情感体验。这些都为后来发展新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教育与学术变革抱负甚大的王国维也希望后来者能将他的文学理论与《红楼梦评论》视为标准。他因此时常批判,中国学术教育界历来不推崇纯粹的哲学思考,不重视文学的情感美学本质,以至难得看到“真正文学”。^[6]但仅靠批判显然成就不了一番文学课程革新事业,王国维引入悲剧哲学推出情感本位的文学本质与标准后,便将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与自家文学理

论相符的文学研究,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挖掘具有哲学美学精神的文学遗产,从而贡献了以“中国抒情文学及其境界之美”作为基本研究框架的文学新课程。

二、中国抒情文学及其境界之美:文学课程的内容架构

就内心而言,王国维并未因为1904年推出《红楼梦评论》及“悲剧”文学理论获得平静,相反他依旧十分焦虑,当时的他仍然认为教育学、哲学、文学均是急需发展的学科,但一人之力怎能背负如此重任。他很希望有人站出来,像他热爱文学那样,满怀热情、不计功利地“深究(本国)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分担其教育学理想,携手为中国开创崭新的教育体系,重建国人过于世俗的思想与精神生活。但这份希望在当时常常只能落空,他也因此更觉“可悲”。^[7]提及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王国维完成《红楼梦评论》后,大可以放弃其学术教育努力,即使他能独自同时承担教育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重任,也未必能实质性地革新当时的中国教育与人心。

令人钦佩的是,王国维没有放弃,而是用了近十年时间,来深化他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这里所谓的深化,是针对此前实验的两点不足而言。首先,《红楼梦评论》只是亮出了情感美学本位的文学新理论,仅有它,显然谈不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或不足以支撑一套文学新教育的课程内容;其次,就拯救日益被历史变迁遗弃的本国文学而言,仅向国人示范用“悲剧”美学理论分析《红楼梦》,其教育力量无疑十分单薄,远不能引导国人更全面地走进本国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两点正是《红楼梦评论》在教育上的局限之处,但王国维后续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弥补了这两点不足,王国维因此切实深化了自己的由德国“悲剧”美学和《红楼梦评论》开启的文学课程革新努力。

1906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先后发表《教育小言》、《文学小言》。从中可以看出其文学课程革新实验的具体深化路径。这两篇议论虽名曰“小言”,实际却是在勾勒其情感本位的文学教育所具有的基本“大义”。前一篇意在激发“为学”的“兴味”与“意志”,等于是继续自勉。其中“文学”作为其教育努力方向,也有显露,所谓“伟大之文学”,^[8]以进一步兑现此前便已形成的坚定文学教育理想“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9]随后发表的《文学小言》正是王国维落实其文学教育的具体方案,它清楚透露了王国维将以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来架构他的文学教育。

关于《文学小言》,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研究。最新分析是将它视为王国维文学理论奠基之作,其中许多观点,如文学是超功利的“游戏”,“景”和“情”是文学的两大本质特征等等,均“影响到此后若干著述如《人间词话》境界说及其范畴体系的形成”。^[10]本文认可这一分析,但同时更想指出,就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而言,《文学小言》其实是在延续并深化王国维此前的情感文学思索,并将情感文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文学课程即因此不再局限于《红楼梦》,而是可以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中选择文学课程内容。就此而言,《文学小言》堪称王国维情感文学教育的“课程纲要”。

这份文学“课程纲要”由 17 则“小言”构成。其中显示,王国维文学课程所含内容十分广泛,既要学习骚、诗、词等“抒情文学”(前 14 则),又要研究元代杂剧、明清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后 3 则)。这里无法探讨每一则的细节规定,而只想强调,在王国维的文学“课程纲要”中,重点无疑是“抒情文学”研究,尤其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以及苏轼等“第一等大文学家”的诗词作品,更是重点之重点。宋以后的“叙事文学”,虽然表面上不同于屈原以来的“抒情文学”传统,但这只是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史学考虑出发,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形式存在差异。实际上,将元代以来的杂剧、戏曲等“叙事文学”也作为文学课程内容时,王国维依旧重视研究其中的情感美学内涵,因此他非常推崇关汉卿,因为觉得关氏“言曲尽人情”,且“字字本色”,堪称“元人第一”。^[11]

实施上述“课程纲要”,首先需要一一展开其中所列的抒情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王国维亦是十分努力。在发表《文学小言》的同时,王国维便在研究屈原诗歌,示范如何揭示“屈子文学之精神”,欣赏其如何思索、表达自己的“特别之境遇”与“深邃之感情”。^[12]1908 年起,他又开始陆续发表诗词研究作品,其最著名的文学研究范本《人间词话》因此得以形成。而随着《人间词话》的推出,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也进入了完工阶段。通过《人间词话》,王国维成功架构了一套以中国抒情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新课程,并最终将其课程目标界定为感受中国抒情文学的“境界”之美。从此,所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等等,便成了中国诗词研究与教学的经典原则。^[13]

除研究诗词外,1908 年起,王国维还在研究元代戏曲。这是其文学课程最后一部分内容。王国维之所以将戏曲作为其文学课程的收尾内容,固然是“课程纲要”事先拟定,但也与他太看重诗词有关。他不想看到杜甫、苏轼等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便无“真正文学”可言,因此想通过研究元曲,让国人能切实看到,抒情诗词衰弱之后,中国仍有“第一等大文学家”及一流文学作品问世。1913 年,围绕元曲做了五年研究之后,王国维推出《宋元戏曲史》,不仅完整落实了 7 年前制定的“课程纲要”中所列的研究计划,而且深刻揭示了唐诗宋词之后的文学形态演变,同时也让国人认识了关汉卿、马致远等元代以来涌现的一流剧作家、文学家,他们有着和李白、杜甫、苏轼等人一样卓越真挚的情感与美学才华。

三、人间情感的文学安顿:文学课程的教育意义

到 1913 年完成《宋元戏曲史》,王国维的文学革新课程实验便结束了。此后他转入史学领域寻求学术与课程革新。从 1904 年推出《红楼梦评论》起,这一文学课程革新实验持续了大约十年。期间,他先是引入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将文学本质界定为思索人类情感;然后以此文学理论为基础,推出自己的文学课程标准和课程纲要;接着,他又深入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将各历史时期一流文学家的抒情文学作品及真挚情感清理出来,凝聚成《屈子文学之精神》、《人

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文学研究范本,充实自己的文学新课程。

对于王国维十年文学努力的学术意义,民国时期就有许多权威评价。如傅斯年说,五四前后,“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谁都瞧不起的章太炎也从学术新领域开拓的角度,认为正是王国维使得以往不受重视、近乎淹没的杂剧、戏曲等“曲学成为专门之学”。^[14]陈寅恪除表彰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及其卓越的人间关怀外,还特别钦佩其为现代中国学术界树立了学者人格典范。除陈寅恪外,这些权威评价很少触及王国维的哲学情结,但也从学术范式革新与学术人格精神等角度,点出了王国维之于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至今仍是公论。

受到忽视的乃是王国维十年文学努力的教育意义。本文认为,王国维的十年文学努力固然是为了重新解读中国文学史,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与新领域,但更是为了引导国人从哲学与美学角度研究本国文学,认识世俗人间的悲剧结构,寻求高尚优美的思想与情感生活。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探讨王国维文学课程革新实验的教育意义。进而言之,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努力不仅开创了《红楼梦》悲剧美学、中国抒情诗词、宋元戏曲史等崭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藉此贡献了以人间情感教育为宗旨的文学新课程,从而为教育、引导个体在世俗人间安顿自己的情感生命,开辟了一条“境界”优美的文学途径。

在现代教育改革方面,王国维真可谓是独自前行。梁启超、胡适、黄炎培等各路现代教育改革家大都选择从建立“现代文明”体系出发,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科学”、“民主”和“实业”等教育。而王国维却认为,巨变时代最根本的教育挑战是以文学美学来发展人间情感教育,使个体在世俗人间安顿好自己的情感生命。关于这一点,即文学的人间情感教育宗旨或意义,王国维自己在推出《人间词话》前有过长期(1903-1909)思考,为此还创作了自己的文学即《人间词》。其中明确显示,王国维所有的文学课程都是围绕人间情感而展开,意在从哲学与美学高度认识个体所处的被各种功利意志和力量争斗支配的世俗世界,同时通过文学研究,寻求生命的超越与安顿途径,形成高尚、永恒和美好的思想与情感生活。

如佛维所言,王国维之所以用“人间”一词统领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就是为了揭示世俗世界是“一个‘只似风前絮’的人间,是无数‘精卫’充塞其中的人间,是‘混如梦’而必须‘遽然觉’的人间。”^[15]这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王国维的人间情感教育诉求。只是立足于如此通透且悲观的人间情感,必然会使王国维远离当时各路新“精卫”造成的种种现代历史潮流,他的一系列文学新课程与人间情感教育也因此有悖于现代历史潮流。然而各路新“精卫”奋力开拓的现代变革途径能够否定、消除王国维所关注的人间悲情体验与真相吗?如果到最后还是要面对这类体验与真相,又该如何面对?

毫无疑问,兴于西方、并在人间广泛推行的“现代性”工程至今也未消除王国维当年看到的悲剧人间真相“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甚多。”^[16]在“现代性”中沉浮的人类生命也仍处于王国维在《人间词》中所描绘的情感“无凭”状态。对于“现代性”的悲剧结构及

其造成的情感生命无以安顿,西方自叔本华起,建构起了一种文学或艺术的应对传统。之后,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梳理与重建,文学或艺术依然被视为安顿情感生命的上佳途径。王国维来自这一文学或艺术安顿传统,并以自己的文学研究与创作实践,将许多生动优美、几乎被历史遗弃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叔本华的美学框架。

甚至可以说,相比于叔本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大都是从理论上论证,艺术可以挽救现代知识与教育“对存在的遗忘”,但却缺乏艺术实践与艺术教育能力,王国维不仅也从理论上开辟了人间情感的艺术安顿途径,还以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人间词》创作实践,贡献了一系列旨在安顿人间情感的文学或艺术新课程。提及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再度强调王国维文学新课程的人间情感教育意义,还是为了呼吁当代中国教育学者在重视从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寻找“生命教育”启示时,勿忘王国维当年为安顿人间情感付出的哲学、文学及课程革新探索。那么,王国维之后,中国学术教育界有没有谁在进一步深化他的艺术与教育努力,完善、丰富其所开创的文学新课程实验与人间情感教育呢?

由于缺乏研究,本文无法回答王国维文学课程实验与人间情感教育的后续演变及当代生命力,只知道有许多迹象表明,今天的文学艺术课程及其教学实践体系长期被纷繁复杂的意图、理论及功利机制左右,从中很难看出文学艺术课程与教学到底有何清晰、广为认可的本位宗旨,混乱与异化因此时常发生,以至许多教师与学生很难搞清楚,从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意义的文学艺术理论,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学艺术生活。不过,根据王国维的经验,混乱与异化本身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关注本位方向,不去耐心在乱局中探索本位方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王国维历时十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很值得作为当代参照,能够为成分复杂、时常迷惘的当代文学艺术教育寻找本位路径,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5] [6] [8] [9] [12] 王国维. 王国维论学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16 - 219, 311, 296, 384 - 385, 371, 317.
- [2] 张雪红. 王国维教育思想研究三十年[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5): 41 - 45.
- [3] 温儒敏.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3): 192.
- [4]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358.
- [7]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3册)[C]. 上海: 书店出版社, 1983: 671.
- [10] 彭玉平. 王国维《文学小言》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160.
- [11] 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111.
- [13]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212 - 354.
- [14]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8: 12 - 13.
- [15] 佛雏. 王国维诗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31.
- [16] 罗继祖. 王国维之死[C].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9 - 10.

(下转第78页)

Abstract: Schoolyard environment is one of vitally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mpact children's growth.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naturally harmonious environment , positive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vivacious and open environment design might produce the effective and sustained influence on children who grow in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Based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on on several typical schoolyard environment designs , which locate downtown and suburb of Hangzhou , we found that present schoolyard environment design needs more improvement in reflecting educationally implied meanings. Focusing on the harmony between schoolyard environment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 being in accord with students'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 and highlighting school – based culture of design are available strateg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reflecting educationally implied meanings.

Key words: school; schoolyard environment design; status quo and strategy of design

(责任校对: 王 荣)



(上接第 16 页)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dagogy of Human Emotional Life: Wang Guowei's Experiments of Literatur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ZHOU Yong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ragedy philosophy and emotion oriented literature theory , Wang Guowei redefined the nature and standard of literature curriculum shaped by Confucianism and all kinds of utilitarianism. Then he built his new literature curriculum system through research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its esthetic significance , finishing his experiments of Literatur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for the pedagogy of human emotional life. This ten – year long experiment not only rescued and renewed many Chinese literature heritages abandoned by the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 , but also provided the individual in the turbulent world with an esthetic way to settle down his emotional life.

Key words: Wang Guowei; experiments of literatur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pedagogy of human emotional life

(责任校对: 邹 逸)